

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世纪)及其影响 ——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董莉英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陕西咸阳 712082)

摘要 在16-19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传教士担当了“桥梁”的重要角色,学术界主要关注海上来华的传教士的研究,本人通过对陆路来华的传教士进藏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考察至今在西藏仍有影响的天主教情况,旨在探讨中西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正由于有传教士们记录的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独特的西藏见闻,又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最初碰撞,使西藏了解西方,西方了解西藏,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化的研究中来,在西方掀起了一个至今持续不断的藏学热潮,为人类不同观念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天主教 西藏 传播 文化 碰撞

中图分类号:K9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04)03-0060-08

15-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人类文明区域性分割和孤立发展的局面,扩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从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开始,经由中世纪欧洲各种游记记载充满传奇虚幻色彩的远东世界,终于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从而引发了欧洲对东方的征服和侵略。由于葡萄牙在15世纪末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加上造船业、航海业的优势,成为当时欧洲主要的海上强国,因而在16世纪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成为在17世纪初,第一个跨越世界屋脊闯入我国西藏地区的国家,继葡萄牙之后,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瑞士、日本等国的十余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我国内地进入西藏传教,产生了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关于西藏天主教堂和信徒的记载,资料甚缺,本文试图对天主教传入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考察至今在西藏仍有影响的天主教情况,进而探讨中西文化的接触、交流和碰撞。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一、16-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

(一)天主教传入西藏的历史背景

关于东方富庶的传说深入欧洲人心中。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南北,回国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又译《东方见闻录》),书中翔实记述了中国元朝的政治、文化、人口、社会与生活,盛赞东方契丹物产丰富,遍地黄金。此作可称得上是影响欧洲最大的一部作品。西方人对于东方契丹的神秘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1]东方的契丹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黄金宝地。这成为16世纪西方扩张东来的动力。

收稿日期:2004-02-26

作者简介:董莉英(1962-),女,汉族,浙江宁波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与藏学。

16世纪初建立起来中央集权制的葡萄牙王室把占领新的领土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海外扩张的主要政策,正在形成中的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更是迫切需要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一场反对罗马教皇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会在欧洲丧失了大片地盘和大批信徒,迫切需要向外发展来弥补损失;一个垂涎东方有无穷的财富,一个为重振昔日天主教会的声望,不谋而合的专制政府与罗马教廷紧紧地抱在一起,于是寻求财富和扩张宗教成为西方扩张东来的重要源泉,使殖民扩张和宗教扩张几乎同时进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教廷组织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以维护教皇统治,著名的耶稣会由此应运而生。17、18世纪即明清时期传到中国的基督教即属天主教一派,而在此传教的传教士则主要为耶稣会士。

1495年,葡萄牙的著名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后,东方再也不是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了,新航路的发现,使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冲破了阿拉伯人、伊朗人、埃及人的贸易势力圈,“葡人既抵印度,复东进而据锡兰、摩鹿加、爪哇、麻六甲诸岛。东方航权,遂操诸其手。”^[2]葡萄牙人建立起东方霸权,成为16世纪欧洲富有的国家,迎来了葡萄牙资本主义掠夺的黄金时代。1510年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后,立马在果阿派驻传教士。从传教的经验中他们认识到:天主教要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征服中国。1535年,葡萄牙人占据中国澳门后,即把澳门作为向中国大陆传教和商贸的据点。16-18世纪的中国就经济和文化而言虽属于世界强国,但还没有发展对外通商贸易的主观意识。由于沿海各地遭受倭寇的侵扰,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几乎拒绝一切与外界的商贸活动,外来的天主教自然遭到抵制,文化交流也就受到影响。

16世纪的欧洲盛传“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许多地方和仪轨与基督教相似”。^[3]还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延伸到契丹……包括有许多基督徒和拥有神父与主教的众多教堂”。^[4]这令西方人兴奋不已,从马可波罗作品出现的一个近似神话的“契丹”雏形,到1583年利马窦从海路来华,将他所看到的中国与传说中的契丹联系和比较,作出了中国就是契丹的推断。再到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出发,经由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新疆,进入新疆以后沿途所到的都是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地方,最终到达甘肃酒泉。他的重复体验经历,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契丹”就是中国。鄂本笃从陆路来到中国,从而使西方的中国形象从神话最终回到现实,也构成了西方东来与中国直接对话开始时期的完整历史。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关注海上来华传教士的研究,鄂本笃从陆路来华,对“契丹”即中国的证实,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深化,充实、修正并完整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耶稣会士鄂本笃他虽没有经过西藏而是穿越帕米尔之后到达我国河西走廊的酒泉,成为“第一个能呼吸高地亚洲地区稀薄空气的西方人”。^[5]他在叶尔羌时会会见一名藏族“王公”,这位王公向他描叙了居住在“神域”的“大祭司”,此人戴主教冠和穿一件酷似祭袍的丝绸服装。西方传教士们深信喜马拉雅山那边存在着已经被遗忘的基督教兄弟,果阿耶稣会大主教尼古拉斯·皮曼塔在得到葡王大力支持下,开始规划寻找置于别国领域的基督教领地,他很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对喜马拉雅彼侧进行探索性调查的人。

西方传教士在扩张宗教的狂热的驱使下,带着寻找异域基督教的梦想,踏上了寻找被人遗忘在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基督教兄弟的道路,发誓一定要找到他们,而第一个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藏去寻找“基督”的桂冠却被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摘去。

安德拉德于1581年出生在葡萄牙下贝拉省奥雷伊罗的布兰科堡地区,1596年入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并加入耶稣会,20岁被派往印度,1601年在果阿的圣保罗耶稣会学院学习,1612年开始传教工作,他在葡属印度耶稣会的品级上迅速上升,很快被任命为莫卧儿领土上的省会长,就在他飞黄腾达之时,他毅然决然放弃职务的诱惑而做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抉择:穿越喜马拉雅山地区,找到被人遗忘的教徒。

(二)天主教在西藏传播的经过(16-18世纪)

1、阿里——传教的第一站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西部,北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接西藏的那曲、日喀则地区,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西邻克什米尔地区,属西藏高原西部高海拔地区,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阿里地区见诸于史籍的记载,始于象雄进代。藏文史料《玛法木错湖历史》记载,古代象雄,曾分为十八部,与象雄

王室同时,在象雄众多的部落还出现过十八个有名的国王。在最后一个象雄王李米加被吐蕃王朝开国君主松赞干布吞灭。汉文史籍中,一般认为“羊同”,即指象雄。《唐会要》99“大羊同国”条下载:“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代之而起的,是史籍中常见的“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室的后裔贝科赞之子吉德尼玛衮在王朝崩溃后被迫逃亡阿里,在他晚年时将三子分封三处,“长子贝吉衮占据芒城,次子扎西衮占据布让,幼子德尊衮占据象雄。”《西藏王统记》载:占据芒城的一支后为拉达克王国,位于现克什米尔南部;布让一支后为古格王国吞并,位于现普兰县境;象雄一支即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历史,诸史多有涉及,著名于世的重大史实有古格王益西沃选派次仁青桑波为首的21人去印度拜师学法,公元1042年派那措译师前往印度迎请佛教大师阿底峡入藏传法,11世纪在阿里的托林寺还举行丙辰法会(火龙年法会)等等,使古格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复兴运动的中心,影响到西藏各地。古格王国末期,古格王室与寺院僧侣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又与相邻的拉达克王产生过矛盾,此时的古格王国战争不断,危机四伏,而安德拉德就是在古格多事之秋进藏传教的。

安德拉德找到一个合适的伙伴马怒埃尔·马克斯修士后,于1624年3月的最后一天从莫卧儿宫廷启程,经过莫卧儿帝国边境,前往加瓦尔王国,又从加瓦尔王国首都斯利那加出发,越过一片山区,到达巴德里、马纳村,在离开莫卧儿宫廷的四个月之后,终于穿过喜马拉雅山脊,抵达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首都札布让,并里受到了古格王和王妃的特别热情的欢迎。

一路上,他们饱尝磨难与痛苦;他们乔装打扮,躲过盘查,在加瓦尔被怀疑为间谍而遭逮捕,由于证据不充分,在遭受近一周虐待后终于获释。除人为阻力外,还要面临高寒缺氧、一触即亡的疟疾,那里荒芜人烟、天寒地冻,白天黑夜都被冰雪包围,几乎每个人都得了雪盲,积雪几乎没过了他们,安德拉德在严寒中已被冻僵,在一次事故中,他的手被冻掉了一截,但他毫无感觉。干渴又加深他们的痛苦,“我们口渴难耐,连吃雪都无法解渴”。“到处都是令我们头晕目眩的白色,我们几乎无法辨认我们要走的路”^[9]他们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历经千险万阻,最终到达了札布让。由于安德拉德他们在没有得到果阿的命令前往西藏的,尤其是没有把做弥撒时所用的物品带到古格,故安德拉德在古格停留了25天后返回印度,答应古格国王第二年冰雪融化时再来,因为他已考查到“西藏人良好的品德和西藏广阔的土地,为我主传播神圣的福音打开了大门”。^[10]1624年8月他回到果阿,在给大主教的报告里,他声称并没有发现被人遗忘的基督教文明,但他认为古格具有传播天主教信仰的特制良好的环境。使得另外3名教士报名参加与他在札布让共建永久性传教团的工作。1625年8月,他再一次来到古格,他认识到波斯语(波斯语是亚洲传教士所操的唯一语言)只能勉强让藏族听懂几句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传教成功,必须先求立足,于是一边学习藏语,尝试用所学的语言词汇去讲解教义;一边给古格王送去重礼,企求得到支持。

当时的古格王国实行行政首脑国王与宗教首领大喇嘛分立的家族政教合一体制,即形成以国王为首的世俗集团和以大喇嘛为首的宗教集团,具体讲就是古格国王与其弟、叔父、叔祖等为首的三大集团。明末清初时,新兴的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正在取代噶举派(白教)寺院的势力,古格王国的大喇嘛是古格国王的兄弟,是属于格鲁派的,得到卫藏班禅喇嘛的支持,“并任命他为这个王国的‘精神领袖’”。^[11]僧侣势力压倒世俗权力成为当时西藏总的趋势。古格国王想利用安德拉德所宣扬的天主教吸引民众,增强自身权力,达到集政教两权于一身,以便压制格鲁派,削弱僧侣集团势力。于是支持“西方喇嘛”在古格传教,还说:“以安德拉德为总喇嘛,拟以弘扬教法之权,凡属子民均不得侵扰之,我将予以基地助其建筑祈祷堂……”,^[12]还捐献不少资金帮助修建教堂,为划出一块最合适的地盘又不惜下令拆除一些房舍并搬迁居民,甚至拆除两间皇宫辟为花园,还主持了奠基仪式,恰好是安德拉德再返后的一年即1628年8月札布让教堂竣工,教堂内侧装饰着由神父们自己绘制的《新约全书》里的场景,在山壁间竖起了一根很宽的大十字架。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建成了。

随着教堂的建成,五人传教团也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但这里的人民笃信佛教,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受洗礼者共计只有13人,而喇嘛教徒却多达130余人。于是他们采用耶稣会的惯用办法,贿赂古格王,敦促他下令限制喇嘛教的发展,命令喇嘛们还俗,在日土宗还建立分站,还与喇嘛们公开对立,进行辩论,批驳藏传佛教。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激烈冲突,使古格王国原本存在的僧俗集团的矛盾更趋激化。以古格王之弟为首的各寺僧众,形成僧俗一体强大的反对力量,相邻的拉达克王又因土地、婚姻等问题与古

格王之间产生过矛盾,这样在公元1630年古格末代王擢扎西巴德病重期间,喇嘛和暴动的百姓乘机包围王宫,拉达克王立即抓住机会出兵古格,最后将古格王和王室成员诱骗出宫,吞灭了古格王国。古格王被推翻,依靠他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天主教会也告结束,札布让的耶稣会教堂被洗劫一空,安德拉德由于在这之前被招回印度任果阿的行使会长而幸免遇难。他不甘心自己开创的传教事业就这样被葬送,为了恢复在西藏的传教事业,他准备第三次入藏,1634年3月19日在前往札布让的途中不幸中毒身亡。他的老友马克斯也作了同样的努力,但结果还是失败。

2、日喀则传教经过

安德拉德在阿里传教期间,了解到离札布让以东的地方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叫卫藏地区,那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传播“福音”的好地方,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柯钦耶稣会派出赴日喀则的传教团。他们是意大利人卡西拉和卡布拉尔两人,于1626年4月从柯钦出发,经由库奇、卢纳德、帕罗宗、不丹,于1628年1月20日抵达日喀则。日喀则当时是噶举派首领藏巴汗统辖地区,卡西拉他们照例采取耶稣会惯用的方式,给藏巴汗送去厚礼,藏巴汗同意他们在日喀则传教,让他们住在城内环境幽雅、家具设备很好的房屋里,并派佣人,藏巴汗本人还负责一切开销,每月供应许多东西和食品。卡布拉尔对传教充满信心,他说:“我想这个传教会可以成为耶稣会最光辉的传教会之一,因为这里是通向整个鞑靼、中国和其他许多异教王国的大门。”^[10]卡西拉感到要在后藏发展基督教,必须开辟通过尼泊尔去印度的新路线,依旧走从库奇—卢纳德—帕罗宗—日喀则的路线是不够的,因为在库奇王国内无法保障神职人员的安全往来和物质供给。于是卡布拉尔在1628年6月17日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讲:“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主让我们亲临这里的卫藏王国该是多么的好。因为它不仅限于我所陈述的这些情况,而且还包含着以后将会发现的更多的王国。去这些王国的道路不是通过库奇,而是通过尼泊尔。因为它同莫卧儿的土地毗邻。在巴特那和拉贾摩尔路上极为安全,经常有商人来往。”^[11]卡布拉尔带着藏巴汗写给各关卡和各地小头目的介绍信,经尼泊尔回到印度。这样他们就成为第一次抵达不丹、西藏日喀则、尼泊尔等地区的欧洲人。他们在日喀则地区的传教,虽得到藏巴汗的支持,但同样不被当地人民所容,遭受到日喀则僧众的坚决反对,加上卡西拉于1603年3月6日病死在日喀则,只剩下卡布拉尔一人于1631年回到日喀则,此时他对在日喀则传教和建立教堂已丧失信心,他建议把日喀则地区的传教事务划归札布让地区教会,新任的柯钦教省会长没再派人去日喀则协助卡布拉尔,卡布拉尔一人极难继续传教下去,被迫在1632年返回胡格里。不久,日喀则传教会被宣布停止。

3、拉萨传教经过

17世纪初,从陆路入藏传教,不几年就遭受到失败。从海路进入我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被获准自由传教,来往于我国和欧洲的传教士日渐增多。1661年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原名约翰·格鲁伯)和比利时传教士吴尔铎(原名阿尔伯特·道维尔)奉命从北京出发,经过西宁、拉萨,穿越尼泊尔和印度返回欧洲。他们于1661年10月8日抵达拉萨,成为第一批进入拉萨的欧洲人,白乃心在拉萨从事了天文观察,并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装的男女画像。吴尔铎死在印度,白乃心返回欧洲后,将其笔记和肖像草图交给了克舍尔神父,1667年克舍尔神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编著的《中国图说》一书,这是在西方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短短几年间,被翻译为荷兰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各种版本,白乃心和吴尔铎也随这本书的传播响彻欧洲,再一次掀起欧洲人对神秘西藏的好奇心。

18世纪初,天主教的另一派别意大利的卡普清修会^[12]派遣修士进入西藏传教,分为三个阶段:1707-1712年为第一阶段;1714-1733年为第二阶段;1741-1745年为第三阶段。传教士弗朗索瓦·玛利和古瑟普于1707年6月12日由尼泊尔进入拉萨,他们一面学习藏语文,一面免费给各阶层人士看病,博得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后由于资金缺乏,决定撤离西藏。在印度的传教士多米尼科等获悉拉萨教友财源枯竭要撤离时,决定立即去解救,多米尼科和密歇朗智罗于1709年5月19日抵达拉萨,他们准备建教堂传教,由于拉萨远离印度,供给十分困难,最终还是因财源枯竭被迫退出西藏,多米尼科神父前往罗马请求帮助。意大利的卡普清修会第一阶段的西藏传教工作结束。

18世纪初,耶稣会又重新开始西藏传教,1714年耶稣教总会又派出意大利人德西德里和葡萄牙

籍神父佛雷利进藏传教,他们由印度出发,经过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于1716年3月18日抵拉萨。佛雷利因不堪忍受艰苦的工作环境“酷寒和食品匮乏,几乎不适于欧洲人”,便在抵拉萨几天之后就匆匆返回印度了。德西德里便成了此时留在拉萨的唯一一个欧洲人。

为了博得西藏当局的庇护,支持他传教,他采取第一步即拜会西藏高层,赠送礼物;他给拉藏汗送去一瓶治中风的药水、一瓶巴西的镇痛香膏和两块加斯帕尔——安东尼奥石赢得了拉藏汗的欢心,拉藏汗叫他留在拉萨,不用害怕。若有人来骚扰他,他会受到保护。还叫他学好藏语,以便不用翻译随时与他交谈。不久,拉藏汗和他的宠臣达甘扎西因中毒,生命垂危,又是德西德里闻讯后,送去一瓶叫“罗马塔里亚卡”的药,治愈了拉藏汗他们的病。从此得到拉藏汗更加关照,拉藏汗派人转告他,如果他能够说服拉藏汗的话,“我,我的整个家族及朝臣、属民都将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德西德里欢欣鼓舞,在西藏的六年里,除了节日、写作和一些特殊情况外,每天从清晨至太阳落山,都学习藏文。过了一段时间,他能够使用藏文写作,在运用藏文能自如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时,他试图用藏文写一本批驳藏传佛教观点和宣传天主教教理的书。他一直幻想,使拉藏汗皈依天主教,依靠拉藏汗的势力来振兴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谁料拉萨城遭到蒙古准噶尔部的袭击,拉藏汗被杀,德西德里被迫从色拉寺逃到塔布地区的宗纳,在那他完成了用藏传佛教传统的“藻饰文体”批驳藏传佛教的三卷本著作。去罗马求援的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在得到罗马教皇援助后重返拉萨,展开了与耶稣教会传教士德西德里争夺传教权的斗争,最后决定由教皇裁决,教皇把在西藏传教权给了卡普清修会,当卡普清修会把正式教令拿给德西德里时,他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懊丧于1721年4月25日怀揣着他的三卷本著作离开拉萨返回印度。

几乎就在德西德里抵拉萨的同时,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神父和另外两个教友也出现在拉萨街头,他是作为卡普清修会第二阶段的意大利传教士进入拉萨的。他于1717年4月到色拉寺学习藏文、佛经,这为他日后翻译藏传佛教的典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除口头讲解天主教教义外,还将一些解释天主教教义的书籍翻译成藏文,引起了藏传佛教僧人的阅读、讨论、争辩的小小热潮,天主教一时成了僧人们的热门话题。奥拉济奥还谆谆诱导七世达赖喇嘛和康济翊,竟然让他们颁布了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藏族信仰自由的谕令。迎来了卡普清修会在西藏传教的黄金时代,最后于1726年9月正式在拉萨建立了僧馆和教堂,苦心经营许多年,但发展教徒寥寥无几,奥拉济奥也因身体每况愈下被迫于1732年8月25日离开拉萨。1741年,罗马教廷又派了9名修士来拉萨想重整旗鼓,扩大影响。不料清朝大军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安定了西藏地方,于1745年立即驱逐传教士,卡普清修会的教堂彻底关闭,外国传教士在西藏的早期传教活动失败。卡普清修会在拉萨的天主教堂已无处寻觅,只是在大昭寺有一口刻有拉丁字母的小钟,据说是他们的遗物,其他一切已荡然无存。^[1]

二、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人类社会是在彼此碰撞与交流,互取优长中进步发展的。自1624年耶稣会教士安德拉德来到阿里传教的那天起,西方文化也就是和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独特文化——西藏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东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传教士以极大的热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来到雪域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也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批介绍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历史见证人;掀开了藏传佛教神秘面纱的一角。

在安德拉德成为西方进入中国西藏的第一人前,中国西藏对欧洲来说了解甚少,只有零星传闻。安德拉德将入藏亲身经历以书信的方式详尽地记录下来,是关于西藏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西方藏学形成时期具有奠基价值的著作,使这位思想家、观察家,成为西方藏学的鼻祖。与其以后到达西藏的耶稣会士,都在对于西藏及其文化的真实了解与研究、著书立说、传播西藏文化以及推动藏学西渐方面做出了贡献。书信材料中首先他破除了喜马拉雅山这边有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其次,他把沿途旅行、古格王国、藏传佛教、卫藏等方面的情况都介绍给西方。特别介绍了西藏人对宗教的特别虔诚,定时祈祷,无论男女老少,每人身上都带有圣盒,里面是喇嘛抄写的经文。还描写了喇嘛的习俗和服饰:

喇嘛终身不结婚,他们一生的声誉很好。衣服是毛织品,外罩同我们的长袍,但无袖子,因此双臂总是裸露的。腰带也是毛织的……除了披风有时也有黄色的外,所有衣服都是红色的。他们的帽子有两种,

一种和我们的修士风帽相似……另一种是大喇嘛专用的,形似我们的主教冠,上端是缝合的。喇嘛寺庙整洁,里面塑像都是金的,墙上有壁画。喇嘛的日常义务是传教诵经,总以庄严的辩论结束这样的祈祷(诵经)。辩论完毕后,他们便穿上中国式的长衫,戴上帽子,手持布条,有节奏地敲着铃跳着舞,舞蹈极为复杂,歌曲也极为和谐。有些德高望重的喇嘛,走在路上,会被许多人包围,人们向他们鞠躬,请求祝福,喇嘛用手为他们摩顶……

他还谈到西藏人的性情“绝大多数富有感情,而且英勇善战”。还描述了西藏的民风:男人们总是手拿念珠,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不庄重的话,他们都深信神的话和灵魂自救,生活极为简朴,夏天打仗,其他时间操练,箭术高明,很少劳动;女人们总是不停地劳动,如纺织毛披风、种地等,就连王后也纺线。

他还谈到古格王国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只生产少量小麦,只有城郊部分土地可以引水灌溉;牲口很多,有绵羊、山羊和马匹,一年里只有3个月不见积雪,田地上长满绿草,可以放牧牲畜,那里没有白糖,也没有水果、蔬菜和豆类,更没有家禽,大多东西都依靠外地提供,不缺肉,也不缺麦子、稻谷和奶油。还记载了古格“是通向其他许多王国的大门,在那些王国里,人口众多,他们都相信相同的宗教,讲着同一种语言”。每年都有商队运来中国内地各种各样的商品,如生丝、陶瓷、茶叶和其他物品。茶叶在这里被大量饮用,价格极为昂贵。因为古格是中国内地到西藏,再延伸到印度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地,也是丝绸之路位于西藏西部边陲最后的一个商业中心,故古格王朝在安德拉德的笔下极为繁荣。

安德拉德重点描述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正面交锋,就是他与喇嘛们进行的两次辩论,第一次是关于上帝本质的辩论,第二次是关于灵魂轮回的辩论。他极为反对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恶报等学说,反对那些带有本教色彩的驱魔打鬼等仪式。喇嘛们仍然坚持捍卫西藏传佛教的教义和经书。结果天主教文化却难于在这块土地上扎根。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西方人在西藏的首次传教活动也告失败。很多藏学家认为:古格传教会札布让的遗物荡然无存。其实不然,根据1985年西藏文管会考察队的考察,在清理标号为Ivy126洞中堆积的箭杆中,发现了一个骷髅面具。面具内外裱糊的纸张上均有文字,经鉴定是葡萄牙文《圣经》片段。除内侧一片,外侧三片纸上印刷字以外,其余全为手抄字,内容为《旧约全书》第一篇《创世记》中的第39节、40节的部分内容。这类面具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中喇嘛所佩带的,而籍以保存的葡萄牙文的《圣经》,应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看到在古格王城札布让遗址发现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唯一遗留物。它进一步确证葡萄牙耶稣会安德拉德等传教士于17世纪上叶曾经在札布让活动过的事实。^[4]

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卡西拉和卡布拉尔两人为开辟新的传教领域,千里迢迢,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日喀则地区传播“上帝的福音”,成为第一批抵达不丹、西藏日喀则、尼泊尔等地的欧洲人,通过耳闻目睹,把沿途各方面的情况都报告给柯钦耶稣会,卡西拉主要报告了不丹的自然条件、物产、贸易、风俗、宗教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卡布拉尔对西藏的报告很简单,但对日喀则藏巴汗宫殿富丽堂皇和卫藏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描绘的较清楚。由于卡西拉和卡布拉尔在日喀则的时间不长,对日喀则只是初步且粗糙的了解,但毕竟是第一批西方人亲履西藏日喀则地区,把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情况第一次介绍给西方人,促进了西方对西藏的了解。

奥地利人白乃心和比利时人吴尔铎是第一批进入拉萨的欧洲人,也是探索北京经拉萨、尼泊尔、印度、君士坦丁堡返回欧洲的第一人。白乃心具有天文历算和数学知识,擅长绘画,他测量了拉萨的纬度和高度,后来被证明是比较精确的;他还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饰的男女画像;他对西藏的宗教记述比较多,谈到了人们对达赖喇嘛的无限崇拜,进觐者“以难以置信的热情吻他的脚”,他“俨如一位教皇”。还谈到达赖喇嘛的转世和六字真言等问题。还把藏传佛教和基督教作了一些比较,得出“他们的宗教与罗马宗教在许多根本上是一致的”。^[5]返回欧洲的白乃心将自己的旅行笔记寄给克舍尔神父,克舍尔在1667年出版了由他编著的《中国图说》,书中虽有不少错误,但将大量西藏实地见闻和中国优秀的建筑学、桥梁学及其他许多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产与矿产资源介绍给西方,并翻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远渡重洋,千辛万苦闯入西藏,在西藏的几年里,他潜心学习藏语文,通过亲

身经历、耳闻目睹以及阅读藏文书籍,全面了解了西藏的地貌、交通、山川、湖泊、气候、物产、资源、城镇、村落和政治制度、民情风俗、文化艺术、宗教等情况,以大量的报告、信函、游记,向西方人展示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独特文化。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博士将德西德里的数十件信函和报告,收入《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第五册。菲力波·德·菲力毕先生将德西德里的四卷论述旅行情况和西藏情况的数种手稿,加以综合,并对其中有些内容加以精简,有的改写成提要,有的加以删除后,译成英文,编撰成《西藏纪事,1712-1721年耶稣会士毕斯托利的意大利托·德西德里的旅行》。德西德里对西藏各方面情况了解的广度、深度,都令西方后来许多学者大加赞叹。德西德里在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经典的基础上,用藏文撰写了一些批驳藏传佛教观点和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在《西藏纪事》一书中,第三卷就是专门论述藏传佛教的原理、教义、宗教庆典和仪轨、派系、寺院组织、活佛转世制度、最高领袖以及对藏传佛教的批评等等,几乎囊括了藏传佛教的方方面面。由于德西德里对西藏情况的了解、研究和介绍比较深刻、系统和全面,成果甚丰,因此可以说,德西德里是西方早期杰出的藏学家,只是他是从宣传基督教的目的出发的。^[16]

卡普清修会西藏传教士不仅介绍西藏的地理知识、物产、商业贸易、政治制度、民俗等情况,而且将一些有关天主教教义的意大利文、拉丁文或法文书籍,译成改写成藏文,向藏民宣传,也将西藏的一些经书翻译成意大利文,向西方宣传。比如奥拉济奥神父翻译的藏传佛教典籍有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佛本生记》、《皈依》,以及关于佛教戒律的《波罗提木叉经》等。第一批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弗朗索瓦·玛利他们编纂了《拉藏词典》,后经多米尼科改编于1712年底返回罗马时,也将这部词典带到罗马,引起许多西方人学习藏语的热情。在《拉藏词典》的基础上,奥拉济奥神父编纂成《藏意、意藏双向词典》,有35,000条词。1738年,奥拉济奥在给罗马教廷请求援助的报告中,用近一半的篇幅,分35个专题论述了藏传佛教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既有轮回转世学说、僧侣等级制度、活佛转世的认定、神庙、达赖喇嘛的培养等方面的介绍,也有关于藏传佛教佛经、斋戒、静修、护法神的神谕、宗教徒治病、处理尸体等方面详细情况。进入18世纪,到西藏的商人、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越来越多,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讯、报告等更多。和17世纪进藏传教的传教士留下的著作都表现了西方人对于西藏文化的了解,这些著作,主要涉及西藏物质文明,较多的描叙介绍西藏的山川、气候、以及西藏人的生活起居、饮食、服装、音乐、舞蹈等,这些文化现象,是研究一个民族,一种社会的钥匙,通过这些作品的描写,使诱人的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留下更多的美好印象和神秘。这些包罗万象的关于西藏社会、宗教、历史、地理、文化等“文献”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独特西藏见闻,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使西方了解西藏,西藏了解西方,为人类不同观念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交流和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互补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以及希腊罗马的宗教和哲学领域的人文思想;同时他们学习藏语研究藏地的习俗,梳理历史,诠释哲学,欣赏艺术和文学,通过译介,著书立说把西藏文化介绍到西方。西方各色人等的游记、日记、札记通讯和报告尽管其中包含一些负面的东西和观点,但是因为其中包含大量的西藏物质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等许多方面的具体翔实记载,因此使之成为西方藏学家了解和研究西藏文化最宝贵的文献。不管西方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向西方介绍西藏文化的,但的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化的研究中来,在西方掀起一个至今持续不断的藏学热浪。

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的时间很早,从16世纪以来就策划,17世纪进入阿里、日喀则、拉萨地区传教,尽管在西藏活动了一百多年,但结果是失败。18世纪以后,就全方位的以通商、探险、游历、传教甚至武装入侵等手段入侵西藏。有的论者认为“目前,伊斯兰教在西藏还有清真寺,基督教则完全绝迹了”。其实不然,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就有一座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天主教教堂,信徒达740余人,^[17]有一位神父、两位老修女和两位待学修女。教堂内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主”的巨像,其下有十字架和圣水、圣松以及点燃成对的蜡烛等供品。圣所两边立着耶稣及父子的泥塑像,堂内两边墙上挂满了耶稣在人间受难的全部图像,中间的几根木柱上挂满了圣母子及耶稣的画像。每日做二次弥撒,礼拜天做三次弥撒,圣诞节仍是一大节日。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世界各民族在相互学习、撞击、比较、竞争求新择优的环境中创造出各民

族的文化,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是极有益处的,文化交流不仅过去曾经推动过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于现代和将来,更是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让人类在理解、尊重、交流的旗帜下拥抱,共创多元文化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及注释:

- [1]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304.
[2][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91、407.
[3]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56.
[4](法)米歇尔·泰勒(著)、岳岩(译).西方发现西藏史(上)[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9辑)[J].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406.
[6](美)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徊笏(译).西藏探险[M].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13;斯文·海定.穿越喜马拉雅,西藏的发现和探险(第三卷)[M].英国伦敦,1913,301-302.
[7][8]中国藏学[J].2001(3),56,53.
[9]西藏研究[J].1989(3),61;威塞尔.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中亚1603-1271[M].海牙1924,66-67.
[10][11][14][15][16]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288、289、258、339、586.
[12]卡普清修会或译嘉布遣小兄弟会,为方济各修会分出的一支,于1528年由玛塞·巴西创始于意大利。因该会会员服装附有尖顶风帽,故名为卡普清修会,提倡安贫、节欲、发四愿,过清贫生活,影响较大。
[13]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A].西藏研究[J].1989(3).
[17]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史略[A].西藏研究[J].2000(3).

SPREADING OF CATHOLICISM IN TIBET (16TH -18TH CENTURIES) AND ITS INFLUENCE

Dong Liying

(Department of Nationality Study, Tibet College of Nationality, Xianyang, Shannxi, 712082)

Abstract: During the cour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16th to 19th centuries, the missionari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bridge". Academic circl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an by sea. In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n the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Tibet by l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Catholicism even now in Tibet, I discuss the contact, exchange and colli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Because of record of those missionaries about their special knowledge of what they saw and heard in Tibet in that periods, and also the beginning of original colli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from their own cultural angle, Tibet and Western countries knew each other, which has attracted groups of western people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Tibetan culture, an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e in different concept of human.

Key words: Catholicism, Tibet, spread, culture, collision

碰撞与交流

作者: [董莉英](#)
作者单位: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陕西, 咸阳, 712082](#)
刊名: [西藏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4, 19(3)
被引用次数: 3次

参考文献(12条)

1. [郭守田](#)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1981
2. [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 1982
3. [伍昆明](#)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1992
4. [法米歇尔·泰勒](#). [岳岩](#) [西方发现西藏史](#) 1992
5. [约翰·麦格雷格](#). [向红徊笱](#) [西藏探险](#) 1989
6. [斯文·海定](#) [穿越喜马拉雅, 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13
7. [查看详情](#) 2001(03)
8. [查看详情](#) 1989(03)
9. [威塞尔](#) [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中亚1603-1271](#) 1924
10. [伍昆明](#)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1992
11. [余素](#) [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 1989(03)
12. [保罗·泽勇](#) [盐井天主教史略](#) 2000(03)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李蓉](#). [Li Rong](#) [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 -[西藏大学学报](#)2006, 21(1)
文章试从分析早期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背景、传教阶段、特点、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对早期天主教在西藏的渗透活动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和评述,以期较为客观、准确、全方位地把握17-18世纪入藏活动的天主教的概貌,了解天主教传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天主教的传入给西藏近代社会带来的影响。
2. 学位论文 [竺金琳](#) [康熙与朱子学](#) 2000
康熙二十二年,国内实现荡平内乱外祸之后,康熙将眼光转向“文治”。当时其主要面临:该族的萨满教、西藏的喇嘛教,西方的天主教、原有的汉族的理学。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同时又是统一帝国的皇帝的康熙,一面要维护该族的种族特征,另一方面又要巩固整个帝国的统治,所以在满汉文化信仰的冲突上不得不对汉族妥协,把该族的信仰放置一边。对喇嘛教的推崇只是为了稳定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一旦当三十九年准噶尔的叛乱平定后,康熙就下令改变蒙古地区信仰喇嘛教之风。储位之争和礼仪之争最终迫使康熙放弃西学,选择朱子学作为全国的统治学说。而康熙的尊朱等于躬行践履的文化政策恰好符合其巩固统治现状的需要。朱子学又同传统的文官教育制度密不可分。上述历史过程说明统治学说的确立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3. 期刊论文 [郭永虎](#). [Guo Yonghu](#)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宗教学研究](#)2006, ""(4)
文章对我国学界关于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近20年来,学界主要围绕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动机、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原因、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和冲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 期刊论文 [保罗·觉安拉姆](#). [Bao Luo](#). [Jonga Lhamo](#) [近代盐井腊翁寺事件原因分析——兼论其相关问题](#) -[西藏研究](#) 2006, ""(3)
盐井地处藏滇川交界地区,腊翁寺是盐井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腊翁寺事件,史称“腊翁寺之乱”,现今有必要分析这桩事件的起因。纵观历史,藏滇川划界不明与腊翁寺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设立盐厘局与“该寺不应”是发生腊翁寺事件的起因之一,而天主教传入盐井、招收信徒、修建教堂、强占土地是发生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从该事件的原因分析中给我们的启迪是,依法管理寺庙、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宣传“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反对分裂、维护稳定工作的重要环节。
5. 期刊论文 [秦和平](#). [张晓红](#) [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的传播——以“藏彝走廊”为视角](#)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30(2)
本文选择藏滇交界处天主教会为研究个案,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地理特征为切入点,认识近代天主教在藏、怒等民族民众中的传播历史及特点。在介绍天主教西藏教区设立与遣使入藏企图之后,文章着重分析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藏区传教事务,以及册卡传教点的兴衰,进而揭示天主教会利用“藏彝走廊”的特殊地理走向,在坚守巴塘传教点的同时,南下延伸至澜沧江、怒江中流部分地点,东北发展到道孚、炉霍等地,并且据此分析天主教会选点的考量及其变化。
6. 学位论文 [华中](#) [中国基督教地理的初步研究](#) 2006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信徒最多,2001年全球基督徒占总人口的32.54%,并以1.4%左右的年增长率不断增加。其信徒遍及全球各大洲,中国也

是其传播范围之一。早在唐朝贞观9年(635年)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各地传播。根据《Operation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的统计,2001年中国有基督徒九千多万(包括港、澳、台),占全国的人口比例约为7.25%,年增长率达到7.7%,信徒遍及全国各省。

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基督教地理则是宗教地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至今只有郑耀星1997年发表于人文地理杂志的《福建省基督教地理的研究》一文对福建省1990年代后期基督教的传播和分布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本文对中国基督教地理进行初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阐述进行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研究内容为基督教在中国为唐朝、元朝、明末清初、近代和1949年以后五个历史时期传入的政治、地理背景和空间拓展过程、分布情况及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范围为中国全境,由于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围广,本文研究尺度一般以省为单位,在个别的年份当中,则以城市和县为尺度,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

第二章主要描述了景教在中东地区的发源、传播以及在唐朝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以唐朝都城西安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第三章主要论述元朝时复兴的景教和初来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分布。两者都是以北京为宣教中心,景教主要分布在北京、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中国西北部和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三省。天主教则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广东之间的沿海各省。

第四章主要论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沿海地区及陕西、山西等地传播和分布情况,指出当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分布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汉中、上海和南京、福州和澳门为核心的四个集中区域。并总结了前三次基督教来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

第五章重点分析新教从中国沿海到内地的空间拓展和分布,同时也概括性地论述了同时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新教在华的空间拓展分为四个时期:(一)预备时期:以马六甲为中心;(二)五口宣教时期:以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为中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教;(三)内地宣教时期:以沿海为基地,迅速向内地宣教,至1900年时,中国当时除西藏外都建立宣教士驻地;(四)全国宣教时期。新教的分布沿海最为密集,中部次之,西部分布则少得多。天主教在中国所有省区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直隶、江苏、湖北、广东、四川数省。而东正教则主要分布北京、蒙古、东北地区,在江浙、湖北和广东也有少量分布,无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与新教和天主教有很大差距。并简略地概括了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六章论述1949年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和分布情况,重点分析2001年中国基督教的分布情况。

第七章为结语,简要回顾本文,概述研究结论,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7. 期刊论文 尕藏加,德吉卓玛 藏区多元宗教共存之历史与现状 -中国藏学2008,“(2)

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藏族地区并非藏传佛教一统天下的单一教区,而是共存在着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藏族地区不具有普遍性或没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因而藏区宗教,依然以藏传佛教为中心,而多元宗教共存的特殊现象,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或较偏僻的个别村落存在。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巴塘基督教、盐井天主教堂和昌都清真寺与拉萨清真大寺略作考证和描述。

8. 期刊论文 颜小华, YAN Xiao-hua 关于藏边盐井村的宗教与现状考察 -中国藏学2009,“(4)

盐井村隶属于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族自治县,当地聚居着部分藏族和纳西族群众,亦有少量汉族。历史上他们信奉藏传佛教、东巴教或天主教,形成了目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画卷。

9. 期刊论文 张斌 昌都地区寺庙古建筑防火对策研究 -科技信息2010,“(22)

一、前言

昌都地区为西藏自治区所辖七地(市)之一,处于西藏的东缘和连接内地川、滇、青三省的前沿,幅员10.86万平方公里,以教派多、寺庙多、僧尼多、信教群众多而闻名,境内的宗教有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目前,昌都地区共有各类寺庙496座,大多年代久远,风格独特,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使用价值。

10. 期刊论文 喻天舒,刘一南. YU Tian-shu. LIU Yi-nan 从德西德里对藏传佛教的评论看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 -中国藏学2009,“(4)

文章依据《西藏报告:皮斯托亚的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之旅》一书的英译本分析指出,由于该书作者、天主教教士德西德里所持守的基督教信仰本身的强烈排他性,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作为异教的藏传佛教的评论充满了敌意和蔑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藏传佛教当中的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妖魔化的歪曲和丑化工作。这是人们今天在讨论德西德里的著作对于藏学研究的意义时需要对其加以清醒认识的。

引证文献(3条)

1. 郭永虎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期刊论文]-宗教学研究 2006(4)

2. 郭永虎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期刊论文]-宗教学研究 2006(4)

3. 李蓉 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期刊论文]-西藏大学学报 2006(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dxxb200403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2b738201-5ccc-4c53-a984-9e4d00802470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